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国文化传播

阮 静

(中央民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民族标识与国家形象可通过各种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来呈现。作为拥有五千多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认真研究和深入挖掘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中华文化符号及其蕴含的内在价值与精神内涵,特别是其在文化的传承互动、沟通交流与传播扩散过程中对于树立中华民族良好形象发挥出来的作用,以及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产生的影响,将有助于彰显文化自信,更加有效地向世界展示一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好和平、勇于担当、可亲可敬、可信可爱、全面真实、完整立体的新时代中国。

关键词: 文化符号; 民族标识; 国家形象; 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 C95 **Doi:** 10.19898/j.cnki.42-1704/C.20220607.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23)01-0082-09

塑造国家的美好形象,势必要与国家固有的理想信念、目标追求、精神特质和文化遗产等密切关联。一般而言,最能代表一个国家形象标志的,是千百年来传承延续的各种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已牢牢镶嵌并彻底融入到国家肌体和民族血液中。当今,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矢志不移的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阔步前进,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做到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人心、达成共识、鼓舞斗志,就是不遗余力地全面推动了代表中华民族典型特征,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各种经典文化符号,并满怀信心地迈出

国门、走向世界,使之最终转化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理解中国、信任中国、友善中国的精神纽带。

一、中国文化的生成及其符号资源

1.中国文化的生成。在世界众多民族文化当中,中华民族文化沿着有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思想脉络、精神气质、价值选择与制度体系,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风格自主、特色独具、规模宏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宝库。“独有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大环境下展开,因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于政治、社会凡属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才能。遂使中国人能迅速完成为一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世界同时任何民族所不及……”

收稿日期: 2020-10-28

基金项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新时代中国经典文化符号海外传播能力提升研究”(ZK20190217)。

作者简介: 阮静,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西文化比较。

独有中国文化 因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能迅速完成国家之内部之团结与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其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历最悠久的国家,又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独有中国文化,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能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不易腐化。”^[17]

同时,中华文化在几千年演进中,凭着自身的坚毅顽强、大度包容与兼收并蓄,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扎下深根,把一种不易获得、也不可多得的文化基因,牢牢地嵌入到中华文化的血脉当中,使之成为当今世界独树一帜、无以伦比的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这是一种横跨几千年的历史韧性,几乎变成了一种历史惯性。不管承受何等风波依然存活,不管经历多少次‘将亡’‘濒死’依然重生,那就不存在什么侥幸和偶然了,而是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生命。”^[2]中国文化有着“从未远征,自守自安”的自觉坚守,始终秉承以邻为伴、以和为贵、和平相处的基本原则;有着“统裂之间,以统为大”的坚定信念,并让这种信念在秦朝时期最终变成了现实,进而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就算后来反复出现远超以往的纷争与内乱,也不曾对这块基石有过丝毫的撼动;中国文化把“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点滴渗透到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使得人人都有了基本的道德遵循,社会秩序与国家秩序也因此变得坚韧、明确、可续;中华文化崇尚简约之道,因为“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善择大道才会轻松,善走大道方能得寿;中国文化“以德为帜,淡视输赢”,最愿意与人为善,最喜欢成人之美,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唯有“止于至善”,才能激发良知,唯有兼爱非攻,才会尚贤尚同。

2. 中华文化符号资源。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象特征,是一个国家形象的鲜明标

识。人们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认知和了解,往往都是从熟悉和理解其鲜明独特的文化符号开始的。它一般通过十分具体的文化符号完整地表达和呈现出来。

中华文化符号指的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突出而具有高度影响力的象征系统。这是一个全面、完整、立体、综合的系统,是在中国五千多年发展进程中逐渐生成的。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3]可见,系统完整地梳理和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让越来越多经典优秀的中国文化符号在国内率先普及,进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为全面、更加具体地理解和认知中华文化符号,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梳理总结中华文化符号资源,可以按历史顺序的先后,可以按区域分布的不同,可以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出发,也可以从文化的精神层面入手……无论人们准备将其进行怎样一种形式的划分,都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去更为有效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众多的中国文化符号当中,那些已经被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以及文化景观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符号。除此之外,像中国历史人物符号,比如孔子、老子、李白、杜甫、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符号,比如《周易》《尚书》《史记》《汉书》《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传统哲学核心思想符号,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成就符号,比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赵州桥、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符号,比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民族艺

术文化符号,比如昆曲、京剧、越剧,《高山流水》《汉宫秋月》《渔舟唱晚》,大秧歌、腰鼓舞、狮子舞、安代舞,《洛神赋图》《步辇图》《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符号资源宝库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另外,始终与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医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已经传承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等传统文化事象,同样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代表,比如“全聚德”“东来顺”“月盛斋”“稻香村”“川菜”“粤菜”“鲁菜”“徽菜”“重庆火锅”“宣威火腿”“城隍庙小吃”“糖葫芦串”“天津麻花”“狗不理包子”“同仁堂”“片仔癀”“云南白药”“王麻子”“张小泉”“旗袍”“中山装”“蜡染”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不断被创立出来的代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环境等方面发展成就的当代中华文化符号,更需要不断地发掘,比如“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西电东输”“南水北调”“三峡大坝”“中国高铁”“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小米”“青藏铁路”“北京奥运”“太湖之光”“中国航母”“北斗系统”“天宫”“天眼”“嫦娥”“悟空”“墨子”“蛟龙”“大飞机”“港珠澳跨海大桥”“以人民为中心”“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这些中华文化符号资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理念、中国风格、中国意境、中国气象的集中展示,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无疑是全人类共同拥有、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二、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传播及其影响

1. 中国文化符号的历史传播。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以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形式向外部世界逐步推送和展开的。诸如孔子、老子、李白、杜甫,朱熹、苏轼,王阳明、梁启超,丝绸、瓷器、茶叶,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极具浓郁中国元素的中华文化符号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人

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和世界文化的精彩纷呈做出了重要贡献。

17、18世纪的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狂热崇拜中国文化的热潮。“中国皇朝,向来以汉、唐为最重要的时代。”^[4]这两个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与境外开展大范围交流、进行大规模互动更为频繁、也最为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是高起点,隋唐则是高峰期,不仅广泛地吸收和接纳境外其他国家和族群的文化,同时也持续不断向外输出中国的文化,呈现出极为罕见的文化张力与文化包容力。“中国在7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5]

中国文化真正意义上的主动“走出去”,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其后一条通往中亚和西亚的南北路通道被迅速打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汉时期,班超奉命再度出使西域,其部下甘英甚至成为最远抵达波斯湾的第一人。沿着这条自东向西的大通道,中国与境外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延伸到更为遥远和更加广阔的区域。“西域商人把中亚、西亚的产品,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胡桃、葡萄、西瓜、石榴以及汗血马、骆驼、驴等,经河西走廊运到中原,同时,西域歌曲、舞蹈、乐器、魔术、雕刻、绘画也随之传入中原;汉朝以丝绸为主的各种商品运往西域,又由中亚商人转运至西亚、南亚乃至里海、地中海沿岸,远至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6]“中国丝绸的源源西运,不但使丝织品成为亚欧各国向慕的衣料和装饰物,而且随着需要的不断增长,丝绸也成为亚洲西部一些富强的大国如波斯、拜占庭的日常用品,因而必然导致养蚕和丝织技术的向西传播。”^{[7]88-89}最终形成了史上独有的一条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堪称人类文化交流史上规模空前宏伟、持续时间最为久远的陆上贸易大通道,“……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的秦汉之际已初步开通,汉唐达于盛期,一直延绵

到明代中叶 截止于西方人实现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海道大通。在公元前 3 世纪—公元 16 世纪的近两千年间 这条连接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大通道 东西长达 10000 公里 南北宽达 3000 公里 主干道绵延 7500 公里 加上诸扩展延伸线路 总长超过 35000 公里”^[8]。

“经济文物 较之秦、汉 似乎尚有过之无不及。论其疆土 唐代极盛时 北逾大漠 南统安南 东北视汉稍狭 而西境较汉尤广。那时的四夷君长 群尊唐太宗为‘皇帝天可汗’ 诸蕃渠帅死亡者 必由唐下诏册立其后嗣 这俨然是当时的一个世界联邦 而唐之为宗主。唐人因于四边设六都护府 以护理归化诸异族。安东都护府在朝鲜 安西及北庭都护府在新疆 安南都护府在安南 安北都护府在科布多 云中都护府在蒙古 可见唐代立国规模之宏阔。”^{[1]153}

唐代文化的对外交流 既体现在与东亚、西亚和南亚国家的直接交往与互动上 同时也体现在与阿拉伯和拜占庭帝国在信使方面的友好往来上。这种情况在整个东亚地区的表现尤为明显 “外交人员和军队将中国的统治方式引入朝鲜和越南 日本列岛的统治者在政治组织事务上也谋求中国的指导。朝鲜、越南和日本虽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 但是都从中国汲取了灵感并参与和进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更大的东亚社会。”^[9]

唐都长安既是亚洲各国学术交流的中心 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亚洲各国的乐师、画师、舞蹈家、杂技演员和方士在这里云集 各国的贵族、富商、武士和使者在这里出入 佛教、祆教、基督教、摩尼教在这里滋长。“各国使团中有许多学者和专门人才 他们在长安和中国的僧侣、官员与文人交换所长 彼此增进了了解。长安的国学也是少数民族和邻近各国贵族官僚子弟学习的场所 高丽、百济、新罗、日本以及吐蕃、高昌子弟进入国学的有八千多人。这些留学生成为中国和亚洲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骨干 他们将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学和科学技术

带回本国 发扬光大。在长安的各国祆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 以及各国商人 对传播地理知识和科学知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7]145-146}

主动“走出去”与自觉“请进来” 使得大唐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具有了一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鲜明特征 这在更大的空间拓展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诚如费正清指出 “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帝国 唐朝在军事、政治和文化均成为邻国狂热效仿的对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六朝和初唐富有一种文化宽容精神。异族入侵中原时带来了种种异域文化; 佛教则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动力与中介; 地区间的海陆商业贸易亦大大超过了汉朝; 而唐初则与印度和西亚开始直接进行交流往来。总之 在这段时期里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 20 世纪以前的最高峰。”^{[6]87}

汉唐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两个时期 与当时国家统一、国力强大、国运昌盛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文化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与外来文化的互动 最终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周边及境外输入的其他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 诸如佛教、祆教、景教等 都被中国广泛借鉴、吸收和消化 并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兼具融合 令中国文化呈现出远超以往的新活力、新动能与新气象 进而大大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传播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同时促使越来越多具有浓郁中国色彩的中国文化符号走出国门。

2.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中国人和欧洲人这两个民族 居住在旧世界的两端 一个靠近太平洋之滨 另一个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 是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情况之下而在文化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起初 他们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后来通过传闻和间接贸易中的商品交流才相互认识 然后 旅行带来了偶然的接触 最

后,葡萄牙人在1511年占领马六甲之后才有了直接来往和军事接触。”^[10]赫德逊的这段描述,把历史上的中国与欧洲从毫无知晓到开始接触,最终由彼此陌生到相互熟悉的基本情形简明扼要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人们对“西学东渐”的说法似乎更为熟悉和了解,而对于“东学西传”则显得并不十分清楚。“东学西传”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元明时期陆续传入欧洲之后,引发了西方的社会文化生活在17至18世纪流行起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中国潮”。“它即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中国货的精巧、幻美、奇异,吸引着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为西方人新的感性生活提供了理想的风格。”^[11]这股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商人们负责贩运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来充实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传教士们则把孔夫子的哲学以及中国的制度、思想、道德、礼仪和神学等源源不断的传回欧洲大陆(主要是以英法德为主的西欧),使之成为欧洲当时的精英阶层极为看重的“中国时尚”,进而让越来越多的欧洲思想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纷纷把目光聚焦中国,并站在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去阐释对中国的看法。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是欧洲第一位热爱中国的伟大思想家,也是最早全面认真思考中国事情的欧洲人。他所处的时代,恰逢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最初的阶段。众多传教士被派遣到中国传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天启神学,与之同时,传教士们也将中国的道德哲学及自然神学介绍到西方。传教士与哲学家之间的互动在那个时候十分频繁,共同的文化使命使他们发现了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并致力于在欧洲建设一种神学与哲学和谐共处的文化,旨在让人们生活在崇高的信仰与健康的理性中。在莱布尼兹眼中,中国在众多方面

都展示出自己独特的优势“有谁过去曾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无疑中华帝国已经超出他们自身的价值而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们享有东方最聪明的民族这一盛誉,其影响之大随处可见。他们对其他民族所起到的典范作用表明,自有耶稣使徒以来,世上大概还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事业值得耶稣使徒去从事。”^{[12]4,16}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13]13}

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甚至还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作过一些并不公允的评价。但是,他对中国的整体看法还算比较友善:“温厚、柔顺,待人以礼、诚实,这是中国人自幼习得并整个一生都要保持的最起码的品德。他们治国立法,井然有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儒家、道家、佛家的信徒,甚至为该国接受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生活在一起,彼此相安无事。……中国人这种优越的国家政体主要经传教士介绍,在欧洲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不仅那些喜爱思辨的哲学家,甚至就连政治家们也都几乎称赞它为安邦治国的最高典范。”^{[12]83-84}

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和导师,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挥毫写下了带有结论性的三段话,充分显示了中国在其心中的位置:“在四千年前,在我们甚至还不能阅读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用以炫耀的全部极其有用的东西了。……当我们还在阿德尼的丛林里漫游时,中国人那广袤无垠、人烟稠密的帝国就已经被管理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了。……当婆罗门开始统治部分印度时,当波斯人开始制定法律时,当南部的阿拉伯人和北部的西徐亚人还居住在帐篷里时,中华帝国就已经以它光辉灿烂的文化而著称于世了。”^[14]

英国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是 18 世纪对中国展开论述为数不多的英国著名学者之一。尽管他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不足之处,但对于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始终多于中国的事实而不得不发出深深的感叹:“在手工业品和工业品方面,欧洲的技巧和构思一般地说也许要比中国高明,可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贸易,我们总是不得不蒙受巨大的不利。要不是我们从美洲获得源源不断的补给,欧洲的货币量就会迅速的下降,中国的货币量就会上升,直到两地的贮存量大致拉平为止。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那勤劳的中国人要是像波兰人或北非伊斯兰诸国那样和我们毗邻接近,就会把我们货币的超额部分完全吸引过去,而且也会把西印度群岛宝藏的一大部分汲取过去。”^{[13]10}

从上述 16 至 18 世纪的几位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的认知和看法中,已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欧洲产生的影响绝非只是停留在欧洲社会的浅表层,而是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欧洲人的精神世界里。

三、新时代中华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

历史已充分证明,不走向世界,就无法洞察发展大势;不融入世界,就难以彰显自身价值。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变得越来越重,并逐渐

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繁荣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的话,那么新时代中国走向未来的发展,必将是一种在稳步实现更大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持续有效地影响世界、造福世界的全新发展,而这当中需要中国文化来承担的时代责任尤为重大。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几百年前那个妄自尊大、闭关锁国,对本国之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毫无知觉、麻木不仁的封建帝国,更不是一百多年前那个承受屈辱、难言自尊、无力反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今日之中国,是一个已经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华丽转身,正大踏步地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和曾经的历史辉煌相比,中国将再次迎来一个向世界集中展示中华形象、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绝佳时机。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世所罕见的开放格局、令人惊叹的发展速度,正在让中国多层面、分批次、全方位的融入世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国家的竞争力、国际的影响力以及文化的感召力也从中得到大幅提升,为中华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地缘政治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武装冲突的阴霾挥之不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这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些亟待破解、必须应对的少有难题。如果仅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同样也有诸多的挑战在等待着我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总是不失时机、不遗余力、罔顾事实地进行着各式各样的宣传、鼓动与造势,使得当代中国的思想观点、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存在着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遮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同时,中国自身的宣传方式、阐释技巧、传播力度也显得远远不够,因而造成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知晓率和认同度不

高,有时甚至处于“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局面与尴尬境地。

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较之以前取得很大进展,也有了很大进步,但如果要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国际话语权的优势地位相比,存在的差距依然凸显。总体来看,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还显得不够理想。另外,虽说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地攀升,国际社会对我们也前所未有地关注,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靠的还是“他塑”而不是“自塑”。“存在着信息流出流进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5]这与目前中国所拥有的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符、也毫不匹配的。

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16]而这些光靠新闻发布、官方介绍、媒体描述是远远不够的,指望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也是十分有限的。中国亟需在文化传播方面多动些脑筋、多下点功夫去寻找和利用更多、更好、更有效的交流方式来尽早实现。和以往相比,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无论是从政治条件、经济基础、文化实力、社会关注的角度,还是从传播媒介、传播手段、传播途径、传播渠道、传播经验以及传播舞台等层面去看,已经今非昔比、远超以往,可以说正在发生星移斗转、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必须抓住的难得机遇。如何让越来越多带有中国元素的文化符号变成世界欣赏和接受的共享文化符号,如何在新时代条件下有效提升和加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这都是一些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笔者尝试以“孔子学院”为案

例,来说明中华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带来的启示。

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自2005年在韩国建立首家孔子学院以来,到2018年12月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在成都召开为止,已在全球范围的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这些几乎遍布世界五大洲和四大洋的孔子学院在过去14年的时间里已累计培训各类学员1100万人,助力60多个国家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带动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人数达1亿多人。与之同时,举办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展示和中外人文交流活动20万场次,参与其中的民众达1亿人次。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和有效交流的重要舞台。

尽管这一举措是借鉴了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在海外建立歌德学院以及塞万提斯学院来传播本国文化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但却在发展速度、发展规模以及发展势头等方面表现出后来居上的优势。其原因如下:

其一,中国文化魅力独特。连绵不绝的5000年中华文明及其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文化精髓,始终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通过学好汉语来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认知中国发展、感受中华魅力。

其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势必要承担更多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为了让世界理解中国提出的主张,听懂中国发出的声音,尤其需要像孔子学院这样的平台去全方位展示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当代发展与人民生活,努力做到对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从而把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负责任的东方大国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

其三 文明互鉴需求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坚定不移地融入世界 同时 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想通过与中国开展多方合作而获得自身需要的利益 而这一切都要以语言沟通和文化互动为基础。孔子学院恰恰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具有亲和力和实效性的交流平台 更好地推动双边人文交流 加强文化沟通与理解 实现文明互鉴 树立共同发展观。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的发展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确实来之不易 值得认真总结。但是, 孔子学院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旧很多 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如“经济资助渠道单一、文化内容不能契合时代发展需要和文化拳头产品不突出”^[17]以及师资力量数量不足、素质不高, “本土化”进程缓慢 传播渠道单一、传播方式陈旧等问题, 已经影响到了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另外, “在国家布局方面, 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即发达国家的孔院过多 欠发达国家的少 有些甚至还没有一所; 在城市布局方面 未遵循就近原则的中方合作机构不少, 外方承办机构区域不均和城市重叠现象较严重; 在语言布局方面 中外方机构的语言教育因素未能得到很好的重视和考虑”^[18]。而且 不同国家的主流媒体对孔子学院所秉持的态度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孔子学院在当地的发展。《纽约时报》以政府出资为借口 否认孔子学院为文化机构 拒绝承认其作为文化传播机构的合法性 诱导读者对其合法地位产生怀疑甚至抵制 虚化其具体文化交流和运作模式 把中国孔子学院塑造成中国政府海外扩张行动的一部分 从而构建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政治宣传服务的刻板印象。与《纽约时报》的做法完全相反的则是英国《卫报》, 它通过与英国的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和法国的法语联盟相类比 构建中国孔子学院作为国际文化传播机构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通过具体报道中国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威尔士大学建立孔子学

院 孔子学院所开展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未来对英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等 澄清某些对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误解 塑造孔子学院作为文化传播机构的正面形象^[19]。

不言而喻, 《纽约时报》对孔子学院进行长篇累牍的负面报道 无疑是为美国政府正式出面打压孔子学院在美国的生存空间大造舆论。自 2018 年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以来 美国政界便开始从政治舆论上、资金上甚至立法上对孔子学院进行全方位打压 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迫使美国的大学关掉孔子学院。“比如《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实施后 美国国防部允许有汉语旗舰项目的大学申请豁免 在不影响联邦资金的前提下保留孔子学院 但那些大学提交豁免申请书后 又无一不被拒绝 导致一批大学在 2018 年底至 2019 年上半年陆续关闭了孔子学院。其中俄勒冈大学就此发表声明说 为保留其汉语旗舰项目自 2016—2017 学年以来 380 万美元的联邦拨款 不得不关闭孔院。”^[20]应该说 美国孔子学院的处境是当前中美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进行的全面对抗与博弈在教育文化交流领域的直接反映。

尽管孔子学院目前遭遇困境 但其总体发展态势依然比较乐观。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国际亲和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不断上升 愿意与中国开展多方合作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多国政府和民众已经普遍认识到 要想实现本国乃至个人更好的未来发展 就要搭上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 就必须学会与中国人打交道、做生意、交朋友 而掌握汉语是其中最基本的技能。因此 在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社会发展繁荣稳定以及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的基础上, 孔子学院作为汉语国际传播重要机构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经典符号 必将依托强大祖国的支撑 在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之 新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使命 就

是要把一个始终爱好和平、勇于担当责任 繁荣稳定和谐、文明发展进步的新时代的中国告诉世界 以便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实现更为友好、更加广泛地交流与往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当今世界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 在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独有个性和独特魅力的同时 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情感与当今世界的现实需求 着眼于中华文化能被越来越多

国外民众更为广泛地理解和接受 着眼于中华文化符号自觉主动地在传承中发展创新、拓展升级、更新换代 使之融入更多现代化基因和国际化元素 以实现历史中国、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的完美结合 进而形成既有历史传承、又有现代品位、更有未来期待的中国文化符号系统 将其向世界持续不断、一以贯之地推送和展示。

参考文献:

- [1]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2] 余秋雨. 境外演讲 [M]. 北京: 东方出版中心、商务印书馆, 2018: 5.
- [3] 习近平.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N]. 人民日报, 2013-12-31.
- [4] 许倬云. 说中国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19.
- [5] 费正清. 中国: 传统与变迁 [M]. 张沛, 张源, 等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83.
- [6] 冯天瑜, 杨华. 中国文化发展轨迹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7] 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8] 冯天瑜. 中国文化生成史: 上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267.
- [9] 杰里·本特利, 赫伯特·齐格勒. 新全球史 [M]. 魏凤莲, 张颖, 白玉广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98.
- [10] 赫德逊. 欧洲与中国 [M]. 李申, 王遵仲, 张毅译. 何兆武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
- [11] 王寅生. 西方的中国形象: 上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 148.
- [12] 夏瑞春.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M]. 陈爱政,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 [13] 何兆武, 柳卸林. 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下册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4] 何兆武, 柳卸林. 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上册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65、69、72.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12.
- [16]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G]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28.
- [17] 李侠, 等. 孔子学院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变革路径 [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9(3): 90-97+124.
- [18] 张治国. 孔子学院布局规划调查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9(1): 1-9.
- [19] 焦俊峰, 刘美兰. 英美媒体对孔子学院文化形象构建研究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9(4): 13-23+158.
- [20] 崔建新. 美国孔子学院纵横谈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9(3): 4-12.

(责任编辑 哈正利)

deepening at the identity level , or even the remodeling and transformation at the value level , are driven by this conception. Taking Beilun of Ningbo as an example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urban ethnic work; social governanc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Beauty of the Beast –The Northward Movement of the Yunnan Elephants and the Tributed Elephants from the Sou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Elephants Based on Historical Ethnography

HAO Shi-yuan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Asian elephants in prehistoric China and their southward retreat are studi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Yunnan elephants moving northward in 2021.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is studied and the implication is analyzed with the classical saying “There are rhinoceros and elephants in the Mountain of Liang” in the “Erya” of Book of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ibute system in China’s historical period , the tradition of paying tribute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ivory products and the royal records of elephant-taming rituals are discussed. Following a chronological narrativ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knowledge , a historical-ethnographic study is conducted on the grandeur of the Chinese dynasties which received the tribute of domesticated elephants from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and its impact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five directions. The so-called “elephant culture” tradition , derived from the imperial “tributes” , had such a widespread and lasting impact on civil society that modern China was onc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ption markets for ivory products. Since China completely banned the trade of ivory and the processing and sale of ivory products , the awareness and action of elephant protection has been well developed , which is shown in the careful care of the Yunnan elephants in their whole journey northward and backward to the habitat. China call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al lives , and practice the protecting of biodiversity , in which we need to learn from history.

Key words: human and natural life community; Gong Xiang came from the south; Ride the public and control the elephant; peaceful Instrument Guard; Peace and image; warning against hoarding wealth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UAN Jing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mage can be presented through typical cultural symbols.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 glorious civilization history of more than 5000 years , and there has never been a lack of symbolic cultural symbols. A careful and in-depth study of the inherent value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develop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 especially their role in building a good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 interaction , and communication , and their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 will help us to have more cultural confidence , and effectively show the world a self-dependent , self-disciplined , peace loving , responsible , amiable , respectable , trustworthy , genuine and lovable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ultural symbol;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image;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